

# 现实主义，还是一厢情愿？

## 评知识界“中国模式”理论对中共改革意愿的判断（续）

**摘要：**本文拟就近二十年来流行于知识界的一些“中国模式”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评议。中国模式论的主旨，是将中共一党制与有限的民主元素相结合，从而创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但又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理想政体。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理想政体既是道德上可欲的，又是现实中可行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为了长期执政，有意愿与人民共享权力。这是本文下篇，它将指出，对于中共来说，渐进有序地与人民分享权力风险极大。出于对公民参政的惧怕，保持并完善国家暴力机器可能更符合共产党的利益考量。并且，中共非但尚未穷尽其镇压人民的手段，反而有办法将国家暴力机器的运转遮掩起来，以降低其使用赤裸暴力的频率。对中共统治逻辑和利益计算的误判，使得那些力图将中共一党制与民主元素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成为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 四、中共的理性计算

在对中共的“理性计算”进行分析之前，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中共是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巨型政治组织，其多层级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导致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以及高级干部和低级干部利益诉求不一致。对“中共”进行全称判断，在方法论上有以偏概全的风险。当我在下文提及“中共”的时候，一般指的是党的领导核心，如中共中央或政治局级别的干部，他们是中共的中坚力量，占据着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职位，对权力的渴求、对丧失权力的恐惧也更大。而且，他们有力量将自己的意图强加在下级党员干部身上，即便后者的内心可能对自身利益有另外一番感知。党的领导核心对于自身利益的计算，在目前可以代表整个党对于自身利益的计算。因此，当我分析“中共”的时候，指的一般是这个最高级、最核心的领导人圈子。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中国模式论者在一个理论前提上没有大错：在任何社会中，除非有极端情况，统治者的最基本动机就是尽一切可能保存并延续自己的统治权力；而在实在无法保有权力的时候，他们则力图全身而退，免遭清算。自由民主社会的成就在于用制度手段保证了统治者的基本安全：政治精英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并力图在宪法所能允许的最长任期内维持自己的地位；然而，如果事与愿违，现任执政者可以在一次对自己不利的选举中体面地认输，暂时或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且不用特别害怕遭到严重的打击报复，如肉体消灭。

然而，对于没有这种体面退出机制的独裁者和独裁政党来说，政治是事关生死的活动：有多少独裁者能够得到善终，又有多少独裁者死于非命呢？一旦在关键的决策上有所失误，整个统治阶层就可能被颠覆。况且，正如我在上文已经提及过的一点，威权政体一向不长于获取与自身统治地位息息相关的精确信息，独裁者要么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态度，要么不清楚其下属官吏是否忠心耿耿，清正廉洁，爱民如子，而这也是为什么威权政体常常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倒台，齐奥塞斯库夫妇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sup>1</sup>据说，习近平在对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多次引用《诗经·小雅·小旻》中的名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sup>2</sup>他表面上是在警示党员干部，要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抱有敬畏之心，要对中央的权威也抱有敬畏之心；但这何尝不是在说，若非如此戒慎恐惧，时时保持危机意识，我们的党总有一天要被推翻呢？

以上所说，就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中共惧怕失去权力，惧怕人民。这种惧怕，既源于中共本身的威权主义性质，又被苏东剧变和“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恐怖记忆所强化。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时时将惧怕写在脸上，并常常做出

过激的举动应对它察觉到的危机——我们可以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中共，确实比习近平治下的中共要多那么一些泰然自若——但是，只要这种惧怕已经深入骨髓，中共在很多关键的改革上就不会迈出坚定的步伐。

出于对人民的惧怕，中共对于“稳定”这一价值高度关切，难以容忍任何可能威胁自身统治的行为。在中共眼中，社会上的任何异动，无论其多么个别，多么遥远，多么微小，多么“人畜无害”，都有可能是霍姆斯大法官所谓的“明显而紧迫的危险”。“防微杜渐”的古训与“滑坡论证”的思维方式，让中共具备了“见微知著”的智慧和“一叶知秋”的判断力。稳定是第一价值，安全感才是硬道理，在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中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面对安全感的缺失，心存对于绝对稳定的热切追求，中共必须寻找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实现政权寿命的最大化。中国模式的理论家看出了中共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于是，以谏议大夫的姿态，在统治者面前进言说，与人民分享权力吧，这对你有好处！任何长期有效的统治都不能仅仅依恃于赤裸裸的暴力。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如果现在开始稳步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共可以防患于未然，可以以短期的、局部性的不稳定，换来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稳定。百年之后，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但人民“中心悦而诚服”，不再会企图变更政体，追求完全的民主。中国模式论者认为，如果中共真的是理性行为体，它不得不选择这条道路；假如它不选择这条道路，那它就一定不是理性行为体，不会进行简单的利益分析。

然而，这一计算真的如此之简单吗？

任何长期有效的统治都不能仅仅依恃于赤裸裸的暴力，这是正确的。“合法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统治者所提出的一套自我辩护，他们希望以这套说辞向人民证明，服从我们的统治，你们将会安居乐业，国家将会长治久安，这是我们双方都高兴的事情。但是，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去魅化”时代，基于传统和神权的合法性已经消逝，基于统治者个人魅力的合法性又不易得，那么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承诺，就成为了统治者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因此，基于“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劝说中共与人民分享权力，在理论上是成立的。<sup>3</sup>

但是，现实政治永远是暴力与合法性说辞的结合。“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统治者来说，与人民分享权力固然可能降低对政治暴力的依赖，提高政体的稳定性，但用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配置权力、使用暴力，也不是不能达到类似的目标。“任何长期有效的统治都不能仅仅依恃于赤裸裸的暴力”，但假如统治者把暴力做得不那么赤裸裸呢？

更何况，渐进有序地与普通民众分享权力，虽然理论上风险较低，但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这中间不会出岔子。渐进有序地与民众分享权力需要统治者和民众双方具有高度的互信，一方面，统治者相信人民不会推翻自己的统治，对民众偶尔的“越界”行为宽容以待，不会因为一点尖锐的批评和一次躁动的示威游行就骤然关闭政治参与的大门；另一方面，人民相信统治者的“不耻下问”不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自己的意见不会招致统治者的事后报复。最重要的是，博弈的双方具有明示或默示的共识，各自进行自我约束，勤于换位思考，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共商国是，共克时艰。慈继伟2020年出版的《中国的民主》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渐进民主的路径，而他的观点也

代表了很多体制内改革派的思路。在慈继伟看来，香港的民主派选择与中央对抗，既不可欲，也不可行，最终只能招致统治者的反扑。<sup>4</sup>

既然渐进有序的政治改革需要这么高的条件，中共自信是否可以满足呢？我看未必。虽然对中国民众的各种民调都显示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赖——其信赖度在数值上远高于民主社会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sup>5</sup>——但我们很难讲中共和老百姓具有政治上的互信。政治上的互信是一种很高的德性，需要宽容、耐心、理性，以及对于多变时局的冷静判断力。最重要的是，它甚至需要双方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特别是在充满张力的争执中压制愤怒。它还需要双方可以有效管控各自内部的分歧，使温和派永远占据上风，极端派永远无法得势。在日常生活中，连美满的家庭都不一定能具备这些美德，更何况一个政治共同体呢？况且，中共作为一个惧怕人民，从骨子里缺乏安全感的政权，在潜意识中倾向于将各种批评放大化，甚至将其看作党外势力对于中共统治地位的挑战。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有多少温和的、就事论事的普通公民，没有被政府或支持政府的人扣上过“境外势力”的帽子呢？

更有甚者，不光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缺乏互信，上级统治者和下级统治者之间也缺乏互信。就算是中央允许基层政府率先进行小规模政治实验，扩大民众参与，基层领导在无法获得上级政府明确、持续而有力的担保的情况下，也很难鼓起勇气，承担风险，将改革推进下去。然而上级政府明确、持续而有力的担保恰恰是中共体制的稀缺品，这一点，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一书中已经进行了精彩的论述。<sup>6</sup>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中共正是因为对渐进改革所需要的互信缺乏信心，才对公民参政迟疑不决。在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政党眼中，有限民主化的前途晦暗不明，获得批评权的民众很可能得寸进尺，向政府索要更多的权力。与民众分享权力的闸门一旦打开，中共可能自知无法平稳度过短期的不稳定。中国模式论者的提案，其实是一种收益高、风险更高的投资。然而，假如将国家暴力机器更新换代，升级改造，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将权力的行使遮盖起来，一方面强化对人民的控制，一方面又让这种控制显得不那么赤裸裸；这之外，再加上中共对于绩效合法性的一贯热衷，那么，中共的统治说不定会延续更长的时间。而且，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劲政府，中共负担得起这些“维稳”成本。这是一种风险低而收益还算可以的理性计算：在中共看来，扩大民众参与，自己也许几年内就会覆亡；然而，采用升级的高压手段控制民众，中共说不定还能稳定执政几十年。对于一个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我们不能不说这种选择是合理的。

所以说，中国模式论者的谬误主要在于，作为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于“理性利益”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偏差。如果我们将中国模式论者比作投资咨询师，他们的问题就在于，将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包装成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这样一来，当客户出于风险规避的理由而对其推荐的产品充满疑虑时，中国模式论者就只能劝说中共：“不要怕，事情没那么可怕。”然而，一个合格的投资咨询师，应该根据客户本人的风险偏好推荐金融产品，而不是强行改变客户的风险偏好。

## 五、国家暴力机器的优化

威权政府指导下的渐进政治改革是一种风险较高的政治实验，若不是没有

其他可资利用的手段以延续其统治生命，中共不太可能采纳中国模式论者的建议。中国模式论者的第二点判断失误，就是过早地声称中共的列宁主义色彩已经淡化。事实上，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保障政权的稳定，中共一直没有放弃列宁主义的统治手段。在习近平时代，我们还看到了列宁主义色彩的回潮，这就说明，中共要不要强化统治，不是能力问题，只是意愿问题。“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我所定义的列宁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列宁主义，而是组织方式上的列宁主义。一个政党大可以放弃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但不一定放弃由列宁所确立的政党组织原则，和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指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先锋队政党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这一政党在原则上不允许独立于其领导之下的社会力量存在。<sup>7</sup>在列宁主义政党内部，民主集中制是组织生活的灵魂，“民主”能实现几何我们并不知晓，但“集中”的原则常常得以有效贯彻，并压倒民主。本文并不打算探讨中共内部的组织结构，而是重点描述党国体制和社会的关系。

在中国，自从共产党取得全国性政权以来，不仅各级政府机关都处在中共的完全控制之下，社会上的各个团体也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成为中共在各行各业的触角。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人的唯一合法工会，任何组织独立工会的企图都会遭到中共毫不犹豫的镇压。<sup>8</sup>再比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几乎垄断了一切与妇女权益相关的事务，这使得体制外的女权组织步履维艰，很难向国家和妇联施压，为女性提供更好的服务。<sup>9</sup>艺术家有艺术家的社会团体，宗教界有宗教界的组织机构，法律人也有法律人的联合会，他们虽然名义上是“人民团体”，但实际上都只能在中共的领导



下活动，很难忤逆中共的意志。即便是在对“公民社会”最友好的时代，对非营利组织最友好的地方（如广东），独立的社会组织也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并在政府的首肯下活动。而一旦中共强化列宁主义原则，收紧对社会的控制，独立社会组织没有任何手段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sup>10</sup>

列宁主义党国体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和渗透，大幅降低了公民之间联合起来向政府提起诉讼的能力。列宁主义统治术将公民打造成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而他们若要结成组织，也只能在“老大哥”的注视下进行，服从“老大哥”的领导。当一个人利益受损，想要向国家讨还公道的时候，他发现，除非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否则没有有效的办法获得别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事实上，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统治，或者与之抗衡，恰恰是因为一切诸如此类的力量都会被列宁主义的国家机器所瓦解。当公民发现与政府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时，他们也就不再倾向于采取行动了。

列宁主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先锋队政党对于思想、言论和信息的严格控制。淡化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共，可以用其他的意识形态对全社会进行思想控制。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无论这谎言的内容是什么。自从“六四”以来，中共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进行的民族主义教育，可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手笔。<sup>11</sup>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回答，当代年轻人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多大程度上是洗脑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认同（毕竟，他们成长的时代顺风顺水），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体制进行的民族主义灌输，起到了强大的效果。哪怕很多人的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历经磨难存活了下来，国家巨大的意识形态管控能力也让他们望而生畏，逼迫他们活在一种双重意识之中，一方面无法面对良

心，一方面不得不忍受铺天盖地的谎言。

意识形态灌输是列宁主义政党对思想的操纵，而无所不在的言论审查则是中共对信息的管制。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共对于信息流动的控制也日趋精妙。在这个问题上，玛格丽特·罗伯茨 (Margaret Roberts) 2018年出版的新书《被审查者》(Censored) 堪称杰作。罗伯茨指出，中共庞大的网络审查体系，并不需要国家过于频繁地动用赤裸裸的暴力。政府眼中最为敏感的持不同政见者当然会遭到强有力的迫害和威慑，那些直接鼓动他人采取政治行动的言论肯定会迅速遭到弹压，但对于绝大多数网络使用者，他们是感受不到国家暴力机器的直接运转的。中共已经学会去“制造一些小小的不便，将网络用户导向对政权更为友好的信息和社会网络，以降低反对派的政治动员能力，而这一切，经常是在公民没有任何知觉的情况下实现的。”<sup>12</sup>

政府可以采用技术手段，让真实或对政权不利的信息更难获取。比如，网络防火墙并不能完全禁止中国网民获取境外信息，VPN也并非很难获得。但是，对于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来说，VPN的使用费、寻找和安装VPN所需要付出的小小精力，已经足够让他们打消“科学上网”的念头了，毕竟，他们看不出获取这些额外信息对于自己切身生活的好处，也就不愿付出这低微的成本。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在不对真实信息进行完全清除的前提下，大量散布貌似真实的信息，以提高网民鉴别真实信息的难度。

这些小小的技术手段可以给中共带来巨大的政治收益：受教育水平高的公民有能力，也有意愿获取真实的信息，但他们与受教育水平不足的大多数公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就使得前者在社会运动中动员后者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毕竟，“分而治之”是独裁者屡试不爽的手段。罗伯茨将这种审查体制称为“多孔式审查”（porous censorship），它不求对于信息的全面控制，但好处是可以大幅度减少国家暴力机器的直接出场。在这种体制下，暴力机器可以有针对性地镇压最危险的人，或者在真正的危急关头全面封锁消息（比如关于“白纸革命”的报道），但是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国家权力的运行处于一种隐而不显的状态，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好像永远都岁月静好。<sup>13</sup>

中共对于网络的审查，也标志着其对国家暴力机器的优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滕彪将其称为“高科技极权主义”。<sup>14</sup> 科技公司与政府进行密切合作，人脸识别技术极速发展。国家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将摄像头密集地布置在各个场所——公共的和私人的——而任何零星的关于技术伦理的讨论，都遭到了政府迅速的审查和删帖。虽然“高科技极权主义”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依然是个未知数——很多专家就指出，“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立在技术上难度极大——但这一切的问题都在于，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阻止高科技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使用。<sup>15</sup> 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技术的自限性，但谁又能保证，技术上的障碍不会被新的技术所克服呢？

以上所列举的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中共的列宁主义特征，而我想强调的是，列宁主义统治方法的使用，其目的恰恰是要降低对于赤裸裸暴力的使用频率。在一个社会中建立列宁主义体制必须要使用暴力，而且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土改、镇反、整风、反右，让中国大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这一切，都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正当化。然而，一个政权一旦有效建立起列宁主义统治体系，就可以收束国家暴力机器的使

用。毕竟，中共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已经可以极为有效地塑造人们的偏好，将老百姓对政权的威胁降到最低。在“六四”之后的三十余年，国家暴力机器揭去自己的面纱，向全社会所有人展现自己的青面獠牙，大概就是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了。然而，随着新型防疫政策的推进，国家暴力机器再度退到幕后。虽然安全部门一直在对参与11月“白纸运动”的抗议人士进行反攻倒算，但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对这些事情都一无所知。<sup>16</sup>

社会学家斯蒂芬·卢克斯 (Steven Lukes) 在其对“权力”这一概念的探讨中指出，权力不仅仅是强制更改一个人既有偏好的能力，也不仅仅是一种设置议程的能力。最为无形但又最为神通广大的权力，是建立一种社会结构，让被统治者在未感受到强制力的情况下就实现统治者的愿望。<sup>17</sup>列宁主义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结构的范例，它既有利于中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又能将这种控制的可见性显著降低。中共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有效的手段，为什么要抛弃它呢？

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有列宁主义实现程度的变化，但没有从列宁主义到非列宁主义的转变。若说在某些时候列宁主义色彩真的有所淡化，那也是选择性、可逆的淡化。当最高领导人或中共整体觉得有必要再度强化列宁主义原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社会力量能够有效阻止这一决定的执行。习近平过去十年的执政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六、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过去20年间有代表性的“中国模式”理论进行了批判

性的评议。我首先指出，进入本世纪以后，发展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论，已经越来越被政治理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论所取代。我所探讨的中国模式论，指的是学者对中国未来理想政体的擘划，这种政体无论是什么样子，都显著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它本质上是一种升级版的、更加具有道德吸引力的一党制，在这种制度中，经过改造的中共与人民分享权力，实现一党制与民主参与的创造性结合。中国模式的理论家认为，中国正在走向通往这些理想的康庄大道上，因为中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意愿与民众分享权力。他们往往将自己标榜为现实主义者，而批评那些试图引入多党制民主的知识分子不切实际。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批评中国模式的理想本身——这些理想极为华丽，若是真能实现，当然是善莫大焉——而是从中国模式论者的前提出发，批评他们对于中共性质和意图的判断。我已经指出，中国模式理论家所谓的“现实主义”，往往是对中国政治现实一厢情愿的解读。他们低估了中共对人民的惧怕、对绝对安全感的强烈渴望，以及为实现绝对稳定所能采取的手段。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指出，列宁主义原则本身已经包含了能够降低“赤裸裸的国家暴力”的良方，从而可能比扩大民众参与更能保障中共的稳定统治。从中共的视角来看，拒绝与民众分享权力很可能是理性的：既然渐进的民主化改革很有可能带来反效果，那还不如采用既有的手段，对社会进行更加有效、更加精妙的控制，以延长统治寿命。

如果我的论证成立的话，那么它至少说明，中国模式的理论家并没有找到一条通往理想化一党制政府的现实道路。将中国模式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间的争论界定为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争论，并没有乍看上去那么不言自明。更何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列

宁主义政党曾经通过内部改革实现华丽转身，演变成为一种与民众分享权力的一党制政体。这样来看，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反而显得比中国模式派更加现实主义。

但我能理解”中国模式”理论家在历史哲学上的终极关怀：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凭什么不能成为历史的例外，向人类展现一个不同于自由民主，但同样具有道德吸引力的政治组织方式？<sup>18</sup>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由民主派的气魄小了——也许，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一种“未人状态”吧……

注释 .....

- 1 David Runciman, *The Confidence Trap: A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risi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19.
- 2 余仁：“总书记为什么告诫领导干部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https://www.sohu.com/a/225414907\\_819391](https://www.sohu.com/a/225414907_819391)。
- 3 Ben Cross, “Taking Rulers’ Interests Seriously: The Case for Realist Theories of Legitim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2022,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177/14748851221114302>.
- 4 Jiwei Ci, *Democracy in China: The Coming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5 Tony Saich, “How China’s Citizens View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 1, No. 1, 2016, pp. 1-20.
- 6 Joseph Fewsmith,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7 Xiaoping Guo,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8 潘毅：“佳士工潮：中国左翼传统的复活”，*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9月11日，<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0911/china-students-workers-unite/>。
- 9 李思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中国数字时代*，2019年11月22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22677.html>。
- 10 Katherine Wilhelm et al., “What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NGOs in China?: A

- ChinaFile Conversation,” *ChinaFile*, Nov 24, 2021, <https://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what-future-international-ngos-china>.
- 11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3, 1998, pp. 287-302.
- 12 Margaret Roberts, *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1-12.
- 13 *Ibid.*, p. 8.
- 14 滕彪: “六四屠杀与中国的高科技极权主义”, 自由亚洲电台, 2020年6月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tengbiao/tb-06022020164030.html>。
- 15 Shazeda Ahmed, “The Messy Truth About Social Credit,” *ChinaFile*, April 22, 2019,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messy-truth-about-social-credit>.
- 16 叶兵: “白纸运动多名抗议人士被刑拘或传唤, 维权律师义务法援被捕者遭恐吓骚扰”, 美国之音中文网, 2022年12月16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lawyers-offer-free-legal-aid-to-detained-protesters-despite-of-threats-from-ccp-officials-and-pro-government-nationalists-20221215/6877808.html>。
- 17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3rd edition), London: Red Globe Press, 2021.
- 18 赵辉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2年5月23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523/c40531-32427588.html>。



牺牲在乌克兰的志愿者